

近乎赤裸的性爱出境让张艺谋的婚姻出现裂痕

5



黄晓阳 著
华夏出版社友情推荐

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完美谢幕了，总导演张艺谋的功力臻于炉火纯青。开幕式后，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说——我本质上就是一农民。

“农民”张艺谋是如何走进电影界的？这个曾经“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”孩子，又是如何在电影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里步步登顶？本书将真实再现张艺谋的电影轨迹，并详尽讲述其电影之外的多彩生活。

[上期回顾]

拍《黄土地》时，陈凯歌是导演，张艺谋是摄影。最初的方案中，几个主创人员的意见并没有完全统一，张艺谋于是提议再去陕西走一趟。他们一起参拜了黄帝陵，并且在张艺谋的安排下观看了腰鼓阵。那阵势排山倒海、汹涌澎湃，一下子将所有人都震住了。《黄土地》的基调形成了，那就是大，就是对大和色彩的极端强调。

人物纪实

1985年底，张艺谋回到了西安——不是调动，而是借调。张艺谋和广西厂签了一个合同，由西影厂借用一年，一年后仍然回广西厂。这一年的任务也十分明确，那就是协助吴天明拍《老井》。

《老井》是又一个反封建故事，发生在黄土高原的老井村。吴天明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，张艺谋又是一个极善于表现力量的高手，两人的合作，使这部电影就有了60%以上的成功率。剩下的问题，就是要找一个能够表现这种力度的演员。这个演员当然不能是奶油小生的类型，找什么样的呢？吴天明给导演组下了一道死命令：就找张艺谋这样的。那是哪样的呢？用吴天明的话说就是：“外形要像太行山的石头，硬朗，结实，有棱有角，气质要深沉，质朴中有股阳劲。”

可是，吴天明派出的4组人马跑遍了全国二十几个省市，带回一大堆男演员照片，却没有一个与吴天明心中的孙旺泉对上号。电影不能开机，吴天明急得跳脚。这天，吴天明走出电影厂，远远见一个人向自己走过来，他心中一动：这不就是自己要找的孙旺泉吗？近了一看，乐了，竟然是张艺谋。吴天明说：“艺谋，我正找你呢，你敢不敢演孙旺泉？”张艺谋说：“《老井》不怕砸，我就敢试。”

吴天明拉着张艺谋转身便走，来到剧组立即向大家宣布：孙旺泉找到了，就是张艺谋。有好一段时间剧组成员没有说话。有和吴天明关系近、资格老的工作人员也不怕伤了张艺谋，直接对吴天明说：“你的神经没有毛病吧？”这事不仅在

剧组炸了锅，在整个西影厂都传开了。

《老井》的样片出来了，还像从前一样，肖华跑去看样片。显然，看这部电影，对肖华是一次巨大的情感冲击。她有一次看过样片出来，恰好遇到一位同事，那个同事问她：“你带末末去看《老井》的样片了？”肖华回答是。那个同事又说：“你怎么能带孩子去呢？他们都在说你带孩子去看，末末喊：‘爸爸怎么跟阿姨睡觉？’”肖华当即反驳说：“纯粹是造谣，末末才3岁，哪能说出这样的话！”

由此也可以看出，张艺谋和巧英在井下的那场戏演得是如何逼真，对于整个社会的冲击是何等的大。《老井》是个老故事，但吴天明也弄出了一些新意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近乎赤裸的性爱场面。这种场面在今天似乎司空见惯，可在当年这不是一件小事。另一个新意，便是张艺谋所演出的那种男性的力量，那种倔强的力量。这种力量，很快得到了专家的认同，这部影片让张艺谋捧走了1988年金鸡、百花的两大最佳男主角奖杯。

张艺谋真正决定当导演，是在找到了合适的题材之后，也是他借调到西影厂不久的事。

知道张艺谋在悄悄寻找题材，在图书馆工作的肖华便格外留意，有时间便翻阅各种文学期刊，希望帮他找到好的素材。这天，门房送来了新的杂志，有好大一堆。肖华埋头整理，一一归档，其中有新一期的《人民文学》，她拿起来随手翻了一下，发现上面有莫言的一篇小说。肖华知道张艺谋很

喜欢莫言的小说，年初的时候还特意嘱咐过她，以后要多注意莫言，之前他对莫言的《透明的红萝卜》非常感兴趣。将杂志归档之后，她迫不及待地读起那篇小说，没想到一读就迷进去了，想让张艺谋也看看。张艺谋从小就是小说迷，对小说有很高的鉴赏力，对莫言的新小说，他怎么可能不如获至宝？他当即从妻子手中接过杂志，认真地读起来，一边读一边说：“好东西，好东西！”他简直像着了魔一样，连吃饭的时候也在读，完全不知道饭菜是什么滋味。他拿定主意，自己当导演的处女作就做这个《红高粱》。

《老井》出来后，张艺谋虽然已经红透了，可作为导演绝对属于新手，且经济上也还非常一般，去莫言家还是挤公共汽车。那天公共汽车上特别挤，他不敢耽误时间，拼命往上挤，不留神脚被车门给夹了，当时觉得脚一阵麻，因为人多也没太在意。中途有一个妇女下车时突然尖叫一声，大家才发现一溜血由车内顺着门往外流。张艺谋此时才觉得有异，脚板底下一层黏糊糊的东西，低头一看，整个大脚趾都是红的。好心的售票员把他拉到终点站，在卫生所包扎了一下。他便拖着伤脚去见莫言。

莫言当时的编制在北京军区，住在军区大院的一座筒子楼里。张艺谋那天一拐一拐地走进大院，却忘记了莫言的房门号，只好站在楼下喊。不一会儿，远处一个房间的门开了，莫言探出头来问道：“谁找我？”张艺谋说：“是我，我是张艺谋。”莫言一看张艺谋那模样，顿时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你长得真

像我们村子里的人。”

张艺谋不太流利地说明自己的来意，莫言说他已知道，有位朋友已经告诉他了。张艺谋在路上想好的套话竟然一下子没了。好在莫言很容易接近，让他坐下又替他沏茶，主动提起话题，开始谈改编《红高粱家族》的事。不知是不是因为张艺谋“像我们村子里的人”，莫言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合作，同时提出他对写剧本并不在行，是否可以找个专业编剧。

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，当时张艺谋和莫言谈定的版权价竟然是800元。同时张艺谋和莫言还谈定，剧中一定需要大片的红高粱，这东西不好找，得事先种。莫言答应回他的家乡山东高密去找当地农民协商。张艺谋告别了莫言后，又开始和剧作家朱伟以及陈剑雨一起弄本子。当年的12月，剧本出来了，交给西影厂，厂里却有了不同意见，双方争执不下。张艺谋急了：庄稼不等人，错过了这个季节，高粱地怎么办？如果不能在开春时种下百十亩高粱，明年是绝对不可能拍这部影片的。

要说张艺谋此人运气可真是好：招工的时候遇到王闰芝，读大学时遇到白雪石、华君武和黄隽，进入电影圈又遇到魏必达和吴天明。这些人都是张艺谋命中的贵人，比如吴天明，他知道张艺谋心急，于是给他拨了一笔专款，让他拿着这笔钱先去种高粱。

拿到这笔钱，张艺谋立即和莫言一起来到莫言的老家山东潍坊。莫言是当地的名人，他和张艺谋一起硬是一家一家发动，在山东高密的胶河两岸

种上了大片的高粱。到了1987年7月，高粱应该抽穗了，张艺谋再去看，发现叶子蔫蔫的，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火红。他问原因，老乡告诉他，因为今年缺雨，高粱严重发育不良，众人只是挑水抗旱，可高粱面积太大根本顾不过来。如此，张艺谋再一次急了：这可是吴天明冒着风险给自己批的钱，今年这高粱不出效果，他的片子怎么办？还是莫言有办法：他直接找到县委，县委立即送来了化肥，还准备了抽水机。张艺谋于是组织人施肥，安排抽水灌溉。刚刚干了3天，老天似乎也被他感动，及时下了一场透雨。他又在这里待了几天，看见高粱长势非常好，都拼命往上蹿，这才放心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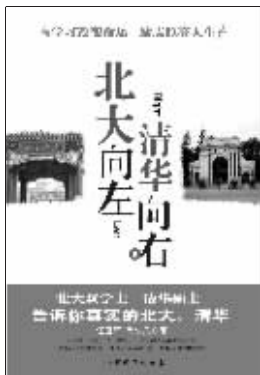
高粱地弄好了，还有一个外景地需要考虑，那就是颠簸所用的外景地，还包括酒坊。这一定要有广阔且裸露的黄土，酒坊要让人觉得有一种苍凉感，这种感觉在山东肯定找不到，甚至整个华东都找不到。张艺谋想到了西北。当初拍《黄土地》的时候，外景地选在西北影视城，对那个地方他有着极深的印象。应该说，张艺谋到西部电影城，才真正找到了《红高粱》的力量和灵魂。

也就是这个时期，张艺谋和肖华的婚姻出现了裂痕。

这道裂痕是因为《老井》。张艺谋为《红高粱》忙的时候，《老井》火得一塌糊涂。对于专业人士来说，或许是因为艺术，或者因为突破，但对于市井小民来说，最吸引他们的是因为电影中大胆的性爱镜头。尽管肖华说不在乎，实际上这事还是对她产生了影响。

北大保安谢景伟讲《论语》引来众人捧场

3



尚尔凡 任卫军 著
当代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本书两位作者结合在北大、清华多年的学习生活以及毕业工作后的反思，向读者展现了顶尖高校内更加真实、丰富的象牙塔生活。本书将带你走进北大、清华，让感人的经历激励你，鲜活的人物感动你，珍贵的体验启发你，幽雅的风景陶醉你。书中更教给人一种面对学习、面对竞争时积极的态度和执著的精神。

[上期回顾]

据说，北大教师、知名诗人胡续冬最早在专栏中把芙蓉姐姐从网络推向了纸媒。最初北大学生追捧芙蓉姐姐，或许看上了她的个性，符合北大人的自由秉性。而另一个因网络热起来的名字——张非，更让人瞠目结舌。网络时代的北大，精彩纷呈，也带给人们更多思考。

热点关注

非北大土著的PK路

傍晚六时许，北大图书馆南门缓缓驶来一辆轮椅车。它的主人是一位女士，她轻便地驾驶着，从我的身边缓缓驶过，通过南门无障碍通道驶入图书馆。这一切，我一直默默注视着，眼中充满敬意。我早就知道她的名字——郭晖，北大百年历史上第一位残疾女博士，通过自学迈入北大。

北大的本科生总是标榜为“土著”，而如郭晖一般，没有经过北大本科经历的北大学子，被戏称为“非北大土著”。这不是北大学子特有的情结，但凡国内名校都有此类现象，甚至国外名校也如此。哈佛大学的哈佛学院(本科生)也一样有优越感。毕竟四年本科生活浸润，收获的养料是丰厚的，土著们有骄傲的资本。但从我接触的非北大土著们身上，更能感到他们与众不同。他们通往北大的PK路充满荆棘，更令人尊敬，也给了我们更多启示。

“若不是梦想的烛光照亮眼前晦暗的道路，我们是无法前进的。”一个人有了梦想，才是有希望的。一个人有了对梦想的坚持，这个人才能拥有灿烂的现实。郭晖12岁时因误诊延误治疗而导致高位截肢。最初日子里，她只能闲赋在家，后来一位老师给她指明了路：参加没有围墙的自考，学习不用奔波的英语专业。郭晖像是抓住救命稻草般投入学习，梦想着走向知识的最高殿堂。她先后拿到自考专科、本科，后来参加研究生进修，取得了硕士学位。

为了能达到梦想的北大读书，她冒险地给北大外国语学院沈泓教授发信，询问报考博士生事

宜。沈教授鼓励，让郭晖坚定了报考北大博士生的决心，最终她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北大百年历史上第一位残疾女博士。

熙熙攘攘的北大康博西餐厅里，我的朋友——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夏军给我讲述他的PK路。他生在安徽农村，年少时家里穷，他只好选择了读中专，后来参加自考取得大专。为了补习大学英语，他在3个月内恶补了全部课程；为了学会围棋，一个暑假，愣是用泥巴做出棋子，靠着一本棋谱成为班里的“高手”。

夏军说：“在现状下做到最好，绝不后悔。”这是他时刻提醒自己的一句话。正是凭着这样的信念，让他从农村走入城市，从中专迈入博士。

“心动不如行动”，有了心仪的目标，就要像夏军所说的那样，积极投入行动中。如果立志到北大读书，OK，无论你现在是在读中学，还是读大学，还是工作，都没有关系，规划好行程，立刻投入行动吧！

直线距离固然近，但曲线也有其弧度美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徐晓东——北大外国语学院博士生，一个年过30岁的“非土著”。坐在北大杨柳博士宿舍里，书桌上到处堆放着英文原版图书，他给我讲起他的求学经历。

徐晓东生长在江南小镇，自幼憧憬能到最好的大学深造。虽然他很聪明，但高中成绩严重偏科，导致高考败走麦城，无奈走向打工生涯，但他没有扔下课本，随时寻找学习机会。后经人指点，他报考了自考英语专业，因热爱英语，第一次考试，便取得专业课全省最高分。

自考本科毕业后，他仍不甘心，毕竟这是没有围墙的大

学，他没有忘记儿时的梦想。他带着简单的行李，来到省城杭州，开始向浙江大学冲刺。第一年冲刺失败，第二年他终于成功。浙大三年硕士毕业后，他顺利留在浙江财经学院当老师。在别人眼中：“这下总算安稳了吧？”徐晓东在工作几年后，却决定考北大博士生。数年积累，他一举成功。

自考专科、本科、浙大硕士、北大博士，绕了三道弯，徐晓东了却了儿时夙愿。最近市面上有本《一路保送到北大》的书，在北大“土著”中，这样的典型不少，无疑他们是幸运的，没有经过坎坷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顺利，如果一下子不能完成大目标，不妨把目标拆成若干小段，踏实走好每一步，当有一天你实现大目标时，你会发现在弯路中也捡到了更多“金子”。

北大状元并非个个优秀

2007年11月26日，在上海举办的“2007职业竞争力与高等教育职业服务体系中外名校论坛”上，一项有关北大状元的追踪调查引起关注：北大曾对学校状元做过追踪调查，发现其中一些进入大学后学习成绩远比不上高中优秀，就业更没有明显优势，甚至有些人很快变得平庸。

作为一名北大校友，看到这样的调查很难受，那些风光进北大的状元，毕业时怎能没优势了呢？当然，绝大多数“土著”（包括状元）依然很优秀，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不懂得珍惜，等着吃老本，总有一天会落后的。

一位北大“非土著”抱怨：“感觉导师总是照顾本校毕业生的学生，每次实验开会也是那些学生发言最积极。”另一

位北大“土著”反驳：“四年本科生活，对老师和环境熟悉些，这很正常，导师没有偏爱谁！”争论归争论，在我接触的“非土著”中似乎更珍惜北大生活，毕竟对于他们，通往北大的路充满荆棘。

郭晖在北大出版了自传，徐晓东编著了1400多页的《英文观止》，夏军已前往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进修一年。掂量着徐晓东送给我的上下两册书，沉甸甸的，这是他在北大成果的见证。我想，“土著”和“非土著”本身只是一个虚拟划分，在北大现实生活中，关键还要靠你珍惜资源，创造机会。

北大保安讲论语

2007年5月的一天晚上7点，理教124教室挂出了“首都保安员，北大讲论语”的标语。站在讲坛上的并不是某位学术大家，而正是北大的保安谢景伟。

讲座现场来了不少捧场的观众，有北大学生，有媒体记者，有论语爱好者。谢景伟用个人实践和唯物辩证法对论语进行了解读。谢景伟自2002年开始在艰难环境里开始阅读《论语》，2005年，他开始写作20万字的《论语布衣解》。他表示，站在北大讲坛已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，还打出了“不与于丹争风”的口号。于丹在得知保安谢景伟在北大开讲论语后，只是表示：“不能出来听他讲，衷心祝他成功。”于丹说，分享经典是每个人的权利，越多人出来读经典越好。

在每天进出北大大门的世人眼中，门旁站立笔挺的保安们并不会受到过多关注。在世人眼中，保安大多文化层次不高，没有太大的追求。北大保安

谢景伟用自己的方式，让世人注意到了他们的存在、他们的追求，不管他讲座成不成功，这已经并不重要了。

翻开北大的历史，梁漱溟、沈从文、孙伏园、冯雪峰、丁玲等，都在北大有过边缘式的生活经历。在今天的北大，依然活跃着一群北大边缘人，他们中有的为了复习考研，有的是为了提高学识，等等，尽管目的不同，但他们在北大都过着艰难而又幸福的生活。

北大边缘学者柳哲就是其中代表。他1996年3月从浙江金华来到北大中文系自费进修，而后就在北大过上了游学生活。他虽然没有北大学籍，没有佩戴过北大校徽，手中也没有北大校方的任何凭证，但他凭着对学术的追求，先后旁听了数十门课程，数百场讲座，阅读了不计其数的书籍，结识了众多的师长朋友。虽然，他最艰苦时会去拆房工地整理砖块，会去抄写信封，但凭着多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，吸收了北大的众多滋养后，已在北京安家，事业有成，他还牵头组织编写了《北大边缘人》。

“北大边缘人，一个成分驳杂、来去无依的群体，它不断流动又将永远存在。我们在这里活过，爱过！在这里，有梦想闪烁的光芒，有蛹蜕变成蝶的艰辛，还将会看到蝴蝶展翅翩翩飞舞的美丽。”正如我和柳哲等人一起编著的《我的北大故事》中柳哲写的那样。北大边缘人的存在，得益于北大的包容，而北大边缘人的存在也证明了北大永恒的魅力。学界泰斗、北大著名教授张岱年就曾题词：“追求真理，振兴中华”，来勉励边缘人发扬刻苦求学的优良传统。